

朝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乐黛云文选



『贵州学者文丛』编辑出版委员会

第一辑

乐黛云 著

在人类文化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每一个作者都不能不受限于时间和空间的局限。解释者也是一样，他的理解和解释也会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局限。随着时间的进步，解释可以不断变化，不断前进，它本身就是构成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贵州学者文丛

「第一辑」

「贵州学者文丛」编辑出版委员会



乐黛云 文选

朝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乐黛云 / 著

反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朝向“人类命运共同体”：乐黛云文选 / 乐黛云著. —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8.6（贵州学者文丛）

ISBN 978-7-221-14572-7

I. ①朝… II. ①乐…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98572号

贵州学者文丛 第一辑

朝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乐黛云 文选

乐黛云 / 著

出版人：苏桦

责任编辑：黄冰 杨智婷

装帧设计：刘津 陈电

文丛名题写：戴明贤

文丛名治印：喻民康

出版发行：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址：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 SOHO 办公区 A 座 550081

印刷：深圳市新联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2018年6月第1版

印次：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开本：889×1194mm 1/32

字数：350千字

印张：19.25

书号：ISBN 978-7-221-14572-7

定价：60.00元

本书获

2017 年贵州省出版传媒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

◎ “贵州学者文丛” 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 任 慕德贵

成 员 顾 久 徐 静 谢 念 朱新武

黄定承 宋 健 苏 桦

办公室主任 谢 念 朱新武

◎ “贵州学者文丛” 编辑部

主 编 乐黛云

执行主编 顾 久

成 员 张新民 翁家烈 冯祖贻 何光渝

谢丹华 戴 冰 王尧礼 戴 俊



乐黛云

1931年生，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法合办《跨文化对话》杂志主编、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兼任教授；历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十五年、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七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至今。1990年获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2006年获日本关西大学荣誉博士学位。曾任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兼任教授，香港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等多所大学访问教授。在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先后建立中国大陆第一个比较文学方向的硕士点、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2015年4月获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授予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终身学术成奖”。2016年1月获北京师范大学授予的“中国文化国际出版研究文化”奖。

总 序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基本的、深沉的和持久的力量。贵州地处祖国西南腹地，历史悠久，文化多彩。当中国进入进一步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崭新历史阶段，人们从对贵州的“传统”识读转变为对贵州的“现代”惊喜。在创造新时代美好生活的火热实践中，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百姓富、生态美的景象犹如灿烂的画卷徐徐展开。而这一变化，很大程度缘于贵州人对脚下这片土地的热爱，缘于贵州人在发展的过程中获得巨大的文化力量支撑，缘于对文脉的持续夯实和丰富延展。

在浩荡的历史长河中，智慧扮演着引领社会进步的角色，而作为智慧的载体——人，或以细微力量奉献于故土，或以毕生所有倾力于建设，或以所拥学识聚焦于文明。贵州大地曾经出现的“六千举人、七百进士”的人文景象，一直激励着后人励精图治，奋发赶超。在各个历史阶段，贵州涌现出一批批执着于家园建设的热血男儿、巾帼英豪。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贵州学术繁荣发展，人才辈出，新作迭现，在省内外乃至海外成长起一批成果丰硕、有学术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山川风物的每一点变化，人文气韵的每一点累积，无不昭示“贵州精神”“贵州智慧”的现实呈现，折射出时代潮涌背景之下贵州人的专注与努力。

以此为情感触发点，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精心策划指导“贵州学者文丛”（以下简称“文丛”）编辑出版，旨在树立和刻画让人敬仰的人文景象。“文丛”邀请了在当代学术界有影响力的贵州籍或者非贵州籍但对贵州有研究的学者，整理他们的学术成果，承前启后，激励后人，放眼贵州，观照世界，让贵州的形象闪亮，让贵州的声音响亮，让贵州的智慧铮亮。“文丛”的作者既包括如乐黛云、陈祖武、刘纲纪、涂纪亮、曹顺庆、刘扬忠、刘扬烈、何光沪、张朋园等贵州籍的著名学者，又包括非贵州籍但在贵州生活过的专家学者，如钱理群、吴雁南、彭兆荣等，博采众家之长，集中展示贵州文化之风貌。“文丛”在内容上，以文史哲为主，同时又兼采风物；形式上，在保证萃选诸学者的学术精华内容外，兼顾通俗性，以扩大“文丛”的读者覆盖面。

感谢“文丛”的全体作者及其后人，他们客观严谨的学术创新精神、浓烈的乡梓情怀、无私的奉献精神，激励着我们用真心、细心、诚心来编辑出版好这套丛书。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这个“道”就是我们的文化，就是我们的精神支点，值得我们用心、用力去寻觅和追求。希望本“文丛”的出版，能弥贵州文化之气韵，能彰贵州精神之亮点，为建设多彩贵州民族特色文化强省添砖加瓦、催波助力。

“贵州学者文丛”编委会

2018年4月

代序

第三次再出发 ——乐黛云教授八十华诞访谈录

2011年1月31日是乐黛云教授八十岁生日。先生的学术生命与新时期中国比较文学的发生与发展紧密相连。在这个富于纪念意义的特殊时刻，弟子专门对她进行了访谈，请她回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与繁荣，以及她对“比较文学真精神”的理解。先生并介绍了自己“80后”的事业规划。

1948年，先生入北大，开始了一生无悔的事业追求；1980年代，她参与创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和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实现了学术生涯的第二次出发；如今，2011年，我们又惊喜地看到，八十岁的先生第三次启程。谨以此别样的方式，送上我们深深的祝贺与祝福。

一、重回八十年代

●张辉（以下简称“张”）：乐老师，您今年虚岁八十，步入“80后”，（北大）比较所也刚刚庆祝三十岁生日。用严老师的话来说，您是本所的创所所长。我们就从比较所的创立与发展开始，请您结合您本人的经历，回顾一下中国比较文学三十年，并展望未来的走向。这是我们贺寿活动的一个学术性的“节目”。（笑）

○乐黛云（以下简称“乐”）：（笑）谢谢你们。不过，还是对话的方式好，不要我一个人独白。说起来时间真是很快，而事物的偶然中其实也包含着很大必然。比较文学在北大的复兴，以及比较所的创立，看起来是个别事件，但实际上与中国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进程有重要关系，也与北大深厚的人文传统有很大关系。我个人只是在其中发挥了一点力所能及的作用。

●张：这让我想起大概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我读您的《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您在“后记”里说过的一段话。大意是说，1980年，当季羨林、杨周翰、李赋宁等先生在北大号召重建中国比较文学时，您毫不犹豫地充当了一名马前卒。而您想做的也是“鸣锣开道，打扫场地”的工作。现在想来，当时那种筚路蓝缕的工作，真是谈何容易！

○乐：确实是马前卒。之所以加入进去，这与我的个性有关系，与个人经历有关系。我这个人对于“陌生”和“未知”的领域非常感兴趣，喜欢新鲜事物。而进入比较文学这个学科，

当然也与我1952年大学一毕业留校任教，就师从王瑶先生学习现代文学有很大关系。王先生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但他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外国文学方面都有很深造诣。王先生的这个影响，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进入比较文学研究的基础。

●张：我记得您还不止一次地说过，鲁迅先生是“托尼学说，魏晋文章”，如果我们既不懂托尔斯泰、尼采，也不懂嵇康、阮籍，其实是无法研究鲁迅的。也就是说，没有外国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基础，也是无法真正很好研究现代文学的。

○乐：其实不光是鲁迅，我自己后来进一步研究茅盾、郭沫若、巴金、老舍、曹禺、徐志摩、艾青……研究“文学研究会”、研究“创造社”，都感觉到自己知识储备的不足。而这种不足也促使我突破原有的研究框架，试图做一些新的尝试。比较文学，恰好是这样一个打破学科分际、跨越文化与语言界限的学科。进入这个学科，确实让我有如鱼得水、豁然开朗的感觉。

●张：季先生当时找您来做北大比较文学研究会“秘书长”，他原来认识您吗？

○乐：我还在做学生的时候，季先生那时是副校长，1950年在民主广场的一次活动中，他就认识了我。我没有想到，很多年之后，他还对我有那么深的印象。我完全不知道，是他后来告诉我的。正是由于季先生他们这些前辈学者的提倡和引导，比较文学在八十年代的复兴才成为可能。当然，后来全国的学者都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努力，但这种开风气之先的精神，确实是我们北大值得自豪的地方。

●张：八十年代初期，您似乎已经把主要研究兴趣转向了比较文学，1980年您写了著名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1981年又编辑了《国外鲁迅研究论集》。

○乐：《国外鲁迅研究论集》收集了美国、日本、苏联、加拿大、荷兰、捷克以及澳大利亚七个国家的二十篇文章。这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次非常开眼界的工作，因为海外的鲁迅研究确实对我自己的研究有很大促进，而且通过此种研究，我还初步预感到对并无直接关系的不同民族文学进行研究——也就是所谓“平行研究”的巨大可能性。1987年我的《关于现实主义的两场论战——卢卡奇对布莱希特与胡风对周扬》，就是沿着这个思路来写的，你可能看过这篇文章，当年我开“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东方和西方”课程时，讲过相关的内容。

●张：看过不止一遍。我的研究生入学，我也会介绍他们看这些文章。《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以及《关于现实主义的两场论战》，后来好像都在国外发表了，后一篇是在慕尼黑国际比较文学第十二届年会上的发言吧？《尼采》那篇更早，我理解也更有标志性。

最近看洪子诚老师的《有生命热度的学术——“我的阅读史”之乐黛云》，他把您的这篇文章与您的另一则文章《论〈伤逝〉的思想和艺术》放在一起讲。特别讲到《尼采》这篇对他本人以及对当时的学术界的触动。他用了“印象深刻”的说法。他说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大意是：一、转变了人们对尼采的认识，不再把他看成“法西斯思想的先驱”，而成为一个“超

越平庸”的、精神健康的“超人”形象；二、大胆肯定尼采对鲁迅思想影响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三、对于比较文学学科“重建”和在中西文化比较的领域，方法开拓的意义。我觉得洪老师说得更准确、又好。

○乐：三十年前——甚至五十年前的文章了，他还记得那么清楚，让我很感动。

●张：三十年后看来，那依然是中国比较文学复兴期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对您个人学术发展而言，除了这些相关的论文，1980年代初期在哈佛和伯克利的经历，应该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吧？

○乐：1980年夏天，由于一个非常偶然的的机会，我得到去哈佛大学进修的机会。也是哈佛燕京的资助。由于自己的学术在一定程度上转向，我对哈佛比较文学系的学术路数比较向往。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他的创办者之一白璧德教授对东西方文化的汇合曾经那样一往情深，这让我对这个系有某种认同。另一个原因则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由哈佛归来的陈寅恪、汤用彤、吴宓等所倡导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也为东西方文化的汇通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学术空间。我去的时候，是纪延（Claudio Guillen）做系主任，他多次提到：“只有当世界把中国与欧美这两种伟大的文学结合起来理解和思考的时候，我们才能充分面对文学的重要的理论问题。”他的这个观点，深获我心。可惜我的英语还不够好，没有能够与他做非常深入的沟通，但我阅读了大量比较文学的基础理论和有关资料。

●张：我还清晰记得您的自传《我就是我》中的一个细节。您说，到哈佛大学的第一天，办完了一切手续，已经是下午四点了，您却还是去了魏德纳图书馆——如果我没有记错，您是用“迫不及待”这个词。您说您迫不及待地进了哈佛的总图书馆，可是马上就“迷失”了，（笑）因为没有看说明，您从书库里走不出来了。我自己第一次进那个图书馆，首先想到的就是您的这段八十年代初期的经历。

○乐：与外部世界隔绝了太长时间，这也许是一种“文化冲击”的特殊反应吧！这也从另外意义上说明，在中西交流与对话的意义上进行比较文学研究的必要性甚至是迫切性。（笑）中国的比较文学发展，如果从王国维那一代开始算起的话——或者我们叫它“史前期”，显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她不仅仅是学院里、象牙塔中的产物，而与中国晚清甚至晚明以来与西方的碰撞、接触以及对话、交流相关，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可分离。

●张：从大历史的眼光来看中国比较文学发展历程，这是您一贯的观点。在一定意义上，中国比较文学新时期的复兴主要首先发生在北大，应该也与北大人“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有关。

○乐：八十年代特别八十年代初期，中国人重新了解西方确实经历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我们自身也面临着某种深刻的调整与内在变化。你可能在我的自传中看到了，开始在哈佛的一年，我其实没有能完全着手真正的学术研究，白天听课，

晚上还要上英语夜校。不过，这一年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正是在这一年，我确定将自己的后半生贡献给中国的比较文学事业。后来我所做的一切，应该说都和这个决定有关系。

●张：也正是基于这种决心，您并没有马上回国，而是继续留在美国完成了你的英文自传《面向风暴》，并写作了英文专著《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

○乐：1982年到1983年，我有幸被加州伯克利分校邀请为客座研究员，所以我又留在美国两年时间。在那里，我的朋友卡洛琳告诉我，美国的银行有一种服务，你可以在那里租一个小信箱，把你的秘密放在里面。于是在这位好朋友的鼓励和帮助下，我就开始写作《面向风暴》。写之前并没有打算出版，因为当时也不知道中国的情况将会是怎样。我只是有一种冲动，想把自己一生中那异常特殊的二十年的生活记录下来，让后来的人们知道，曾经有这样一段历史时期，中国人竟是这样生活、这样思考、这样感觉的！只想留下一页真实，没有别的想法。

●张：看来你是完全没有料到，这本书一下子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后来不仅公开出版了英文版，而且还出了日文版和德文版。我2000年在美国的时候，课堂上还有学生在讨论你这本书。

○乐：那本书确实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但我想它最值得肯定的大概是它的真实和真情。我的确是毫无讳饰地袒露了我的心。著名的国际友人，三十年代在中国工作过的约翰·戴维斯给这本书写过一个长序……

●张：他说，这本书之所以了不起，并不是因为它是一系列恐怖事件的记录，而是因为作者真诚和敏感的叙述。他说您的“骇人的经验”，给出了一个人类不屈灵魂的例证。

○乐：这本自传，也许可以与我的那本学术著作《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对照起来看。前面一本是关于我个人的，后面一本则是我对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宏观思考。一本是微观的，一本是相对宏观的。那是我接受白之（Cyril Birch）教授的委托而做的一个项目，后来列入伯克利东亚研究丛书中的一种出版。

●张：伯克利这两年真正是收获丰硕！

○乐：对我个人而言，美国西部，尤其是像伯克利这样的地方似乎更合乎我的性情。哈佛当然不是不好，我始终怀念在那里的日子。新英格兰的一切都是那样温文尔雅、绅士风度和富于传统，我也被那里的这种人文氛围所浸染。但到了西部，我却似乎又经历了一次灵魂的大解放。这是同一国家内两种不同精神样式的呈现与碰撞。我清楚地记得，在哈佛上纪延教授的课时，隔四十五分钟，秘书就送来一杯咖啡，对纪延教授说：“教授，请喝咖啡”，这在伯克利是不可想象的。

在伯克利更为自由开放和不拘小节的气氛中，我学到很多东西，特别是受益于白之教授。通过白之教授，我认识了斯坦福大学的刘若愚教授。刘若愚教授试图用西方文学理论来解释中国文论，并且试图把中国文论放在世界语境中来加以认识和考察；这也是我后来从事比较诗学研究的重要起因。

●张：这么说来，编辑《世界诗学大辞典》的某些想法，